

絕對值得一讀的首次全譯本部派佛教論書文獻學之作：

江燦騰*

木村教授著《阿毘達摩論之研究》中譯本的簡明相關解說（下）

三

首先，我們要知道，木村在留學英國與德國期間，很快在一年左右就寫完博士論文全文初稿。那末，其餘的留學期間，他又做了什麼？以及為何他要做這些的原因又是爲了什麼？若能弄清這些，我們之前提出的謎團就自然清楚了。

只是，我不能涉及層面太深廣，因爲我此處的解說，只能直接點核心的癥結點之所在。目的在幫助本書的讀者，能方便地理解此書的出現，其實有其不得不然的歷史背景，我的任務就達成了。

不過，爲了後面的解說之必要，我們此處要先知道，自從木村泰賢到東大讀書後，就與同學宇井伯壽（兩人都是曹洞宗的僧侶），一起前往本鄉森川町的梅檀寮，受業於寮主梶川乾堂門下，聽講有關漢譯《俱舍論》與唯識學等相當名氣的專業講解，打下深厚的改領域知識基礎。

之後，木村在出國留學英德期間，還與東大同事荻原雲來博士共同替國民文庫刊行會論部，從玄奘的漢譯《阿毘達摩俱舍論》，全部翻爲日譯版《國譯阿毘達摩俱舍論》（一九二〇年十月），還加上註釋與相關文獻解說。玄奘的漢譯《異部宗輪論》，號稱最難，最難懂的，也由木村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全部翻爲日譯版《國譯異部宗輪論》，同樣還加上註釋與相關文獻解說。而這些工作，都是跟他寫的博士論文內容直接相關。所以，木村的博士論文之快速產出，有其可能理解的學術邏輯。

問題是，博士論文是爲何而寫？重要的學術意義何在？於是，我此處就必須回歸到木村自從出版一九一五年四月出版《印度六派哲學史》之後，直到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出版博士論文《阿毘達摩論書の成立の經過に關する研究：特に主なる四、五種の論書に就つて》爲止，在這段期間內，木村的主要學術處境又是什麼？除非

理解這一點，否則我們將無從理解他當時，為何能如此傑出又如此豐碩無比的學術開創性劃時代業績？

如今根據我接觸的當時相關資料，以及根據木村在他的公開著作中，都提到，他當時所面臨的東大學術環境的激烈競爭以及不同學術小圈圈的相互排擠，私下批評與嘲諷等言論，都近乎到了毫不遮蓋的地步。因而，最後的倖存者，仍取決於公認的學術實力的最優勝出成績如何？

事實上、一九一五年出版的《印度六派哲學》，雖使他獲頒國家最高學術院的成就大獎，新銳的巨大榮譽光芒燦爛閃耀，各方稱譽之聲一時不絕於耳。但，實際上，並不能當作申請東大的博士學位論文來運用。而且，對於本身已在東大擔任「原始佛教」課程講授的木村泰賢來說，當時他已處在第一線的教學領域之內。若要以之前的《印度六派哲學》出版後，所獲得最高頂級光榮的國家學術成就大獎一樣，繼續再創高峰。

並且，就他所從事的這一行學術標準評定行規來說，特別是就他當時在東大擔任教職的最後歸宿來說，除非他在佛學研究的相關領域，有能出現巨大的學術成就，否則他是沒有機會再更上一層樓的。而且，必須能先獲得博士學位，成為正教授，否則根本沒有可能擔任當

時東大「印度哲學科」第一講座的頂級權威學者。

於是，擺在他眼前的當務之急，很明顯的，他也毫無例外的，就和其他日本學界新舊菁英學者一樣，據當時大家都在面臨的國際最新佛學研究變動的相關情境，最有效性的可能借鏡途徑。但是，他要如何思考這個問題呢？

事實上，他很是很清楚的，在上述情境中，對他本人最有效性的借鏡途徑，就是必須先適時接軌當時以英德兩國為主的南傳巴利佛教論書新研究成果，以及對於當時新發現的印度古代梵文論書原典，或在藏譯中新發現的部分「阿毘達磨論書」資料，如何有效進行學術解讀以及敏銳而正確地搶先做出最佳的相關問題意識，或觀點論述主張上的各點取捨。更具體來說，他當時，其實已掌握了兩大現有的新領域相關認知，因此必須緊快進行現代性的學術大突破，並且為期不能過長。因而，這樣的現實情境，可以部分解釋了他去留學時，為何很快就可以寫出那樣的博士論文的學術產生背景。可是，到底已掌握了兩大現有的新領域相關認知，又是怎樣的一種具體歷史情況呢？

答案之一，是他當時吸收當時東大名教授姉崎正治博士，在其不就前出版名著《根本佛教》一書的新成果

，以及姉崎正治博士在當時日本處於核心地位的「宗教學」相關論述知識及觀點，甚至連姉崎正治博士在當時首先翻譯德國哲學家叔本華核心著作《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一書，也被木村率先吸收，並將運用於他所即將新開創的，把原始佛教中的緣起論根源，類比於叔本華核心著作所提出「盲目意志」，因而形成新佛教「無明」概念的本質內核詮釋主張。

答案之二，是木村在東大的親近論學友長井真琴，也於一九一九年發表其劃時代的新論文，主張南北傳兩部重要論書中，其實北傳的《解脫道論》，與南傳最偉大論書作者佛音（或譯覺音）撰述《清淨道論》，是相同內容時古本原型。

因而，佛音的偉大原創性論著，只不過是根據更早的《解脫道論》改寫本而已。亦即，當時的木村是懷著日本佛學界的最新除成果與問題意識，奉准出國留學，將其在當時英德兩國的相關最權威的南傳巴利佛教研究與翻譯出版機構一些代表性的學者，或長期寄宿其家，密切接觸，或前往聽講，或拜讀最新研究發現，不能實際接觸的，就透過書信頻繁交流請益。而且，在留學期間，他所寫出的各種著作，我已在上面提過了。

此處根據其最親近之一的學友渡邊煤雄的日後回憶

，木村當時忙碌與勞累到，所有著作，幾乎都是躺在床上頭墊著空氣枕邊沾墨汁邊飛快的書寫原稿，導致床單常被墨汁染髒的尷尬情況也顧不得了。

渡邊煤雄也曾根據木村妻子所說的木村在家與出門的生活習慣，她居然生動無比的形容說，木村的勤勉專注治學，可以說，到了幾乎沒有休閒娛樂的社交活動，除非治學或授課必要，他很少與人交談。他的腦筋持續專注思維的程度，可以已到不知飲食滋味好壞的漠然程度。有時吃一餐飯要中斷很幾次，以便他及實際下腦中剛剛想到新發現心得。甚至連外出一個人走路都在專心思考，喃喃自語，並且會將預備搭車的車票，不知不覺地在下意識中將其揉掉丟棄了。

但是，更令人欽佩的是，這樣寫出來的大量著作，如今我們在閱讀時的感覺，簡直就像木村本人所時常提及的，也是當時其他學者陳述過的體會心得：全書內容各章的內容，都是用語明快簡潔易懂，有趣而流暢，就像全書內容，形成有機性的巧妙組合一樣，彼此互相牽連與協調運作。

我們如今，之所以能夠相當程度理解當中的清楚過程，主要論述依據，就是木村日後在其出版相關新著作之前，都先有深思熟慮的「研究大方針」長篇完整論述

。等到新書實際出版之時，就是出現在新書本論之前的導論或序文之中。

因此，一般讀者在閱讀時，就像他正在課堂上對被授課者，很生動講解正確的相關研究方法論那樣。他也能像針對一般程度的初學者，以簡明清楚又有趣味的形式，導讀他在書中的所想治學主要目標，以及其所運用的最新相關國際學術研究視野，乃至他自己的取捨或異議的意見為何？而這是很少像他那樣等級的大佛教學者所能做到的。

但是，為何木村不用比他的博士論文出版之前早九個月，也是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他留學回國之前的一個月，他先在丙午出版社出版了堪稱是當時最新詮釋與撰寫架構的《原始佛教思想論》一書，來當他的博士論文呢？

原因很簡單，此書在寫法上創新，可是把把原始佛教的「無明」當成叔本華的「盲目意志」來詮釋，固然是木村的獨到之處，卻也立刻遭來其他日本佛教菁英學者的激烈反駁。在一九六八年，以「新增訂版」的方式，納為新編六卷版《木村泰賢全集》中之一的第三卷《原始佛教思想論》的卷尾，就附有長篇的木村後來答辯學界對其強烈批判的回應。只是，可惜過去中文翻譯的

《原始佛教思想論》，根本就沒有收入這一學術史大爭辯的內容。其實，木村提前出版《原始佛教思想論》的原因，將其說穿了，就是先行測試當時日本學術界是否可以接受的風向球。

這同時也解釋了，為何木村提出的，沒有包括他繼《原始佛教思想論》一書之後，應該寫出的《阿毘達摩佛教思想論》？而是在他死後，才一九二五年四月，先出單行本的《小乘佛教思想論》。之後在一九二七年，才納入《木村泰賢全集》的第五卷。

如此一來，此書對日後大陸與台灣的佛學界來說，完全喪失了當中的學術銜接點，以至於不知如何恰當地應用木村死後才出版的《小乘佛教思想論》。以下針對我們台灣佛學界從戰後迄今，與木村的上述著作之間，究竟有何重要相關性？我想稍作一點回顧與解說；以及實際點出，之所以有必要閱讀本書其根本理由何在？

四

為何我們現代的臺灣讀者，有必要閱讀此一新出的現代中文全譯本？

理由很簡單，這是第一次問世的現代中文全譯本。並且，日本南傳佛教經論研究的最高權威學者水野弘元

教授，特別為本書日文版所寫的第一流的「解說」，也完整的翻譯出來。而且，我也特別為本書的現代中文全譯本，寫了此一長篇介紹。

可是，在此之前，或者說，從二戰後迄今，雖然有大陸來臺的佛教高僧演培法師，在一九五四年翻譯了木村泰賢的《大乘佛教思想論》，又在一九五七年翻譯了木村泰賢的《小乘佛教思想論》。

可是，他完全不知道木村泰賢的博士論文《阿毘達磨論書の成立の經過に關する研究：特に主なる四、五種の論書に就つて》的存在及其相關內容。而且，他從來臺前就首先透過類似講經的表達方式，以白話文寫出《異部宗輪論講記》，之後在臺期間，又以同樣的方式，出版了《俱舍論講記》。

可是，他也同樣不知道，木村在出國留學英德期間，就曾與東大同事荻原雲來博士共同替國民文庫刊行會論部，從玄奘的漢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全部翻為日譯版《國譯阿毘達磨俱舍論》，還加上註釋與相關文獻解說。他也同樣不知道玄奘的漢譯《異部宗輪論》，號稱最難，最難懂的，也由木村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全部翻為日譯版《國譯異部宗輪論》，同樣還加上註釋與相關文獻解說。因此，高僧演培法師那些費極大時間與精

力出版的幾本與部派佛教論書有關的講記，可以說與現代學術的研究幾乎全脫節了。

以至於張曼濤在一九七八年出版所主編的《部派佛教與阿毘達磨論》論文時，雖然把民國六十年來，在各類佛教期刊目錄上所能找出的中文，包括翻譯的相關文章，其中有不同時間，不同翻譯者所翻譯的四篇是出自木村泰賢的《小乘佛教思想論》或《阿毘達磨論之研究》之部份，而演培法師被選入的一篇，就是出自他所翻譯木村泰賢的《小乘佛教思想論》一書中，有關「部派的幾個問題」。

張曼濤主編的《部派佛教與阿毘達磨論》論文集集中，只提到二戰後來臺的一代佛教義學高僧印順法師，他就是演培法師的主要佛學導師，所出版的兩本著作：《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與《說一切有部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是可以肯定的一點成績。可是，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說一切有部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中，雖是其門下第一高徒演培法師，早在此書之前十年，就已翻譯了木村泰賢的《小乘佛教思想論》，卻在全書中，完全不提。反而是一開始就引用木村泰賢的《阿毘達磨論之研究》上的部分資料。

但是，由於支那內學院的一代佛學大師呂澂，

在《內學年刊》第二輯，所寫的「阿毘達磨汎論」在一九二五年代，就提到木村泰賢的《阿毘達磨論之研究》上的部分資料，而呂澂的「阿毘達磨汎論」，也是與木村泰賢的《阿毘達磨論之研究》，少數列入《說一切有部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一書的相關研究文獻。所以，我不確定，印順法師是否實際讀過木村泰賢的那本《阿毘達磨論之研究》日文版全書？以下我舉幾個例子來說明，我之所以不能確定的根據何在？

第一，木村是曾與東大同事荻原雲來博士共同替國民文庫刊行會論部，從玄奘的漢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全部翻為日譯版《國譯阿毘達磨俱舍論》，還加上註釋與相關文獻解說。在博士論文中，有一章是專門討北傳有部論書中最偉大著作，世親的『阿毘達磨俱舍論』，其實是繼承與改寫的原型，就是號稱四大論書大師之一法救所寫的《雜心阿毘曇論》一書，而這一研究的巨大發現及其結論，此後已成為定論。可是，在印順法師整本《說一切有部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中，雖有各別討論世親的《阿毘達磨俱舍論》，或法救的《雜心阿毘曇論》，卻完全沒有提及兩者的密切關係，也不曾提及木村的此一重要學術結論。這不是很奇怪嗎？

第二，與木村同年獲得東大文學博士學位的長井真

琴，也是精通阿毘達磨論的專家，他是比木村的研究，更早發表劃時代研究的有關北傳佛教翻譯阿毘達磨論經典中的《解脫道論》，就是南傳佛教阿毘達磨論經典中最偉大作者覺音所撰不朽名著《清淨道論》的古本。而這是中國佛經翻譯史上，從未被發現的相關性。因此木村在書中，不但曾引述長井的最新重要發現，甚至也承認受其影響。但是，印順法師在《說一切有部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中，雖簡單提及《解脫道論》與《清淨道論》的有相關性，卻根本弄錯兩者的前後關聯。並且，書中的註解，居然是根據《望月佛教大辭典》的資料，而不曾提及木村泰賢的《阿毘達磨論之研究》的相關部份。這不是很奇怪嗎？

第三，木村當時，也曾受到另一權威學者椎尾弁匡教授《六足論研究》的部分觀點暗示，因此才發現北傳的《舍利弗阿毗曇論》與南傳的《毘崩伽》及《補特伽羅施設論》，其實是由更早的，同一阿毘曇原型，所各自發展的相互關係。但是，印順法師在《說一切有部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中，完全不曾提及木村在《阿毘達磨論之研究》的此一重要討論。這不是很奇怪嗎？

不過，在當代臺灣，現在是二十一世紀的第十八年了，佛教界至少有十萬人以上的人，已讀過或正在讀藏

傳宗喀巴的最偉大著作《菩提道次第廣論》和南傳佛音的最偉大著作《清淨道論》。雖不一定是為學術的目的來讀，可是兩者都涉及部派佛教的各種論藏思想，如何正確理解的問題。而木村的《阿毘達磨論之研究》的現代中文全譯本，就是絕佳的輔助性參考書。

而以上的這一說明，雖不敢說完全解釋了我之前所提出的，為何絕對值得我多年來所極力慫恿臺灣翻譯日本佛學名著的資深專家依觀尼將其全書翻譯出版原因，

以及為何看來如此冷門的書，我卻認為它其實值得現代的讀者來讀。

因為此次的全譯本，是資料最齊全，解說也最清楚的，一本堪稱最佳的，有關「部派佛教論書文獻學」的劃時代權威之作。

（全文完）

註釋：

* 台北城市科大榮譽教授。

山西清涼寺彩塑菩薩可望榮歸故里

【本刊訊】近日兩尊明代彩塑菩薩造像流落台灣的消息，是文博界熱議的話題。正在促成文物歸鄉的台灣鹿野苑藝術學會會長吳文成指出，目前這兩尊明代彩塑被安放在台灣中部地區。他表示，早些年兩岸相關機構已簽訂文物捐贈意向書，但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未能成行。目前的情況來看，二〇一八年秋天文物有望回歸故里。

根據相關報導，兩尊彩塑菩薩原來所在的清涼寺，位於山西平遙縣，該寺始建於元朝至正二年（西元一三四二年），是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上世紀九十年代，清涼寺數尊尊侍菩薩被盜，後流落至台灣私人藏家。

早在二〇一三年，山西省文物局曾委派平遙縣文物局和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員到台灣進行鑒定，確認這兩尊彩色泥塑菩薩為平遙縣清涼寺遺失的尊侍菩薩原物。

平遙縣縣長石勇昨接受採訪時說，平遙縣也正在積極推動此事，並已初步擬定回歸方案。今年四月將赴台灣與相關機構簽訂協議。按計畫九月將會請回兩尊彩塑菩薩。

自一九九九年，震旦集團董事長陳永泰捐贈明代十八羅漢頭像榮歸山西資壽寺後，兩岸佛像文物復歸即持續不斷進行。二〇〇二年，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捐贈隋代阿閼佛頭像榮歸山東四門塔。二〇一六年，佛光山捐贈北齊佛頭像榮歸河北博物院。